

钟 荣 光 传 略

余齐昭 李 坚

钟荣光是南中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一生同私立岭南大学以至广东的教育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钟荣光，号惺可，一八六六年九月七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小榄镇一个富庶的农家。父亲玉龙，初在家务农，后赴香港经商。钟荣光自小随父亲到香港读私塾，其后回广州就读大馆，曾随岭南国学家海堂学长吴道镕学习。十七岁中秀才，二十八岁中举人，其后在广州设馆授徒。这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举国骚然。钟荣光眼看国家内忧外患，而清政府奴颜婢膝、惧外忌新，感于爱国有心，报国无门，因而意气消沉，流连烟赌，纵情花酒，过着旧式士大夫沉迷颓废的生活。

这时，比钟荣光年岁小两个月的香山同乡孙中山，已在檀香山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为职志，并于一八九五年二月回到香港设立兴中会总部，策划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然以陆皓东等革命党人死难、七十余人被捕而告失败，但对于当时死气沉沉的社会，却如暮鼓晨钟，振聋发聩，振奋人心。这年夏天，康有为联合各省入京会试举人“公车上书”，要求清政府变法维新。国难当头，人心思变。年轻的钟荣光受时代风潮的刺激，也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变。他参与了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筹饷工作，并于一八九六年加入了兴中会。从此，他一改过去放荡不羁的生活作风，剪辫易服，以示和清朝决绝，释放婢妾，资助她们上学习医，并积极从事爱国活动。他认为救国宜首先开通民智，鼓吹爱国思想，于是投身新闻界，为《课艺日新报》、《文坛报》等撰稿，其后又与人创办《博闻报》（不久改名《安雅报》）和《可报》，发表许多抨击朝政、切中时弊的文章。不到两年，报馆连遭清廷封闭。这些年代，钟荣光在与教会人士区凤墀、左斗山以及美国传教士等的来往中，对基督教义逐渐发生兴趣，接受洗礼入教。后来他深感要救国救民非学西方先进科学不可，遂决心从事教育事业。

一八九九年，钟荣光被格致书院（岭南大学前身）聘为汉文总教习。同时报名为该校学生，随班学习英文、算学和自然科学。至一九〇五年在该校第二届预备班（中学）毕业。这时钟荣光已三十九岁。

格致书院是一八八五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的哈巴与香便文两牧师发起创办的，得到中国留学生监督容闳和海内外名流的赞助，在美国募捐基金，成立基金会董事局。一八八八年在广州沙基金利埠（今六二三路）设校招生，哈巴任监督（校长），宣称该校的

宗旨“乃造就教育人才，从事牧师、教员、医生以及其他人生历程之使命，用以传授西方科学、医学以及宗教”。帝国主义者往往利用教会开办学校、医院进行文化侵略，但也有不少外国人士是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而热心办学的。格致书院也是在这种复杂情况下创办起来的。

一九〇〇年，兴中会会员、原格致书院学生史坚如在广州谋炸署理两广总督德寿事败被捕，钟荣光多方营救无效，史坚如终于被清政府杀害。

同年，格致书院迁至澳门，改名为“岭南学堂”。岭南邻街有一间著名的灌根学校，校长陈荣衮是钟荣光的旧友，一位以主张改革文言提倡白话而闻名的学者。两人异地相逢，格外亲切。每到假期，钟荣光就请陈荣衮到岭南国文讲习班讲课。灌根毕业的学生也都被保送到岭南升学。后来的女诗人冼玉清教授，就是在灌根毕业后被保送岭南升学的。

这年，沙俄乘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机，出兵占据东三省，次年，中俄谈判，沙俄名为交还东三省，实则限期勒令清政府签订实际出卖东三省的条约。草约公布后，举国哗然。当时在澳门的钟荣光，奔走呼号，联合海外名流一百五十人，于同年四月致电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力促“严拒”签约，“以救危亡”，不料反遭李鸿章复电申斥。

一九〇四年，岭南学堂由澳门迁回广州，在河南康乐村购地建校。钟荣光举家迁往学校临时木屋宿舍。从此他以岭南为家，致力于教育事业。岭南建校之初，只有木屋平房两座，男女学生六十一人，全部寄宿学校，六、七名女生没有宿舍，钟荣光就拨出自己住宅二间给她们寄宿。民国初年，钟荣光任广东省教育司司长期间，又派女生出洋留学。钟荣光大排二千多年来的封建陋规，开创我国教育史上男女同校的先声。

一九〇七年，钟荣光赴日本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组织会议，回程时顺道往华北考察教育。在华北参观时，被清政府以“革命党”“图谋不轨”罪名逮捕入狱三十五天。他自付必死，曾作诗：“世间并无不死药，我生最爱自由花。”表示他准备为国牺牲的决心。后得同乡营救，才免于难。

一九〇八年，钟荣光任岭南学堂教务长。他不愿完全仰赖外国人的捐款来进行学校建设，发起向学生家长募款建造中学生寄宿舍和添置图书仪器。次年，他环游世界各国，满怀爱国热情向华侨宣传募捐建校的意义，号召华侨子弟归国升学，接受祖国文化。

一九〇九至一九一〇年，钟荣光先后在新加坡、越南和美国各大城市募得巨款，用以建设中学生寄宿舍。

一九一一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爆发了黄花岗起义。岭南学生高剑父（岭南画派三杰之一）等参加了这次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后，岭南除了有一部分学生参加广东学生军随师北伐外，全校停课，组织“筹饷队”，分赴全省城乡演戏宣传，为新成立的财政十分困难的广东军政府募得饷款五万余元。

一九一二年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回到广州，于五月七日应钟荣光之请，到岭南学堂向师生发表演说，勉励青年学生为祖国建设努力钻研科学^①。孙中山对于钟荣光办理岭南的规划和成就，寄予极大的期望。就在这个月，钟荣光应聘出任广东

军政府教育司司长。军政府初期的民政、外交两司长钱树芬、陈少白都是出身岭南，当时被称为“岭南三司长”。钟荣光在担任教育司司长期间，大力推行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民主办学方针，改革旧学，提倡新学，废除清代关于学生尊孔读经的规定；鼓吹信教自由；下令拆毁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匾额旗杆和神像；将清代的科举试场改为公共体育场；成立中小学教科书改编委员会，革新教学内容；请准省议会通过拨款二十万元，选拔男女学生一百多人分赴德、美、日等国留学。他根据我国文盲众多的实际情况，特别重视社会教育，设立图书馆、图书室，并派出巡回演讲队到各县市宣传新文化和科学常识，破除封建迷信。通过各种图片、幻灯、白话戏、通俗小报、新式通书等向民众进行宣传教育。为了实行阳历，一九一三年他下令各校阳历新年放假两周，阴历新年严禁放假，学生一律上课，如学生请假过半，给校长记过的处分，若擅自放假，则扣发校长薪俸半个月。

一九一三年七月，袁世凯走狗龙济光入据广东，大肆镇压革命党人，钟荣光也被搜捕，由于岭南学校监督晏文士的掩护，侥幸得脱，当晚乘美舰出走香港，经檀香山赴美国。在太平洋舟中，他感怀时局，痛惜革命事业遭受挫折，写成《广东人之广东》一书，列述辛亥革命后，特别是他任教育司司长时期广东军政府革旧布新的各种措施和革命精神，详述教育司的改革工作，用大量事实揭露袁世凯收买爪牙为祸广东的罪行，让海外华侨及时了解辛亥革命后广东的真实情况。

这年冬天，钟荣光访问檀香山，发动华侨子弟回国升学，同时联络热心人士，扩大海外“岭南之友”的组织，争取他们对岭南作更大的援助。

一九一四年，钟荣光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选修教育学，研究西方教育原理和办学经验。这年，钟荣光的妻子何氏在岭南病逝。后来，有个曾在香港创办安怀女校的老同盟会会员、钟荣光的旧识钟芬庭，任教檀香山，青年丧偶，两人于一九一五年在纽约宣布结婚。当时社会上同姓不婚、夫丧守寡的封建旧习还根深蒂固。两钟订婚的消息传出后，亲朋议论纷纷，有的还出面反对。钟荣光以早年反封建的精神，破除陋习，行其所是，力树新风。

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钟荣光担任国民党纽约支部长，创办《民气报》，团结海外华侨，积极宣传反袁斗争。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帝国主义各国忙于应付战争，无力东顾。平素仰赖外国捐款维持的岭南学校，也顿时失却了财源。为了摆脱困境，岭南学校董事局于一九一七年改聘钟荣光为学校副监督（副校长）。钟荣光意识到依赖外国人捐款办学终非善法，中国的学校还是应由中国人自己出钱自己办，才是正理。他周游美国各大城市，想方设法，发动华侨捐款和遣送子弟回国升学。

一九一七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率领海军和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州，成立南方护法军政府。钟荣光自美国回到岭南，为解决学校财政困难向孙中山和广东省省长朱庆澜要求援助。当时桂系军阀盘踞广东，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经济异常拮据，靠借债和华侨捐款勉强度日。为了支持钟荣光办教育，孙中山还是捐了两千元给岭南^②，再加上朱

庆澜省长的拨款和华侨学生家长的捐助,终于使岭南度过了难关。

一九一八年秋,钟荣光再次到新加坡、印尼、泰国、越南等地向爱国华侨募捐,兴建归国侨生的寄宿舍。这年岭南特设华侨班,招收百余名回国侨生入学,为我国大学开设华侨班首创先例。

这几年,钟荣光先后为学校向华侨捐款建成四座中学生寄宿舍,以及张弼士堂、爪哇堂、陈嘉庚堂、陆祐堂、十友堂、马应彪招待室、马应彪夫人护养院等,使岭南不仅成为当时广东最堂皇秀丽的花园式的学校,而且是主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设起来的华南第一所大学。

钟荣光的教育思想,是重视学以致用。他环游美洲、南洋各国,参观当地农业,感于中国以农立国,而农业落后;广东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八成以上,而粮食不能自给,认为欲求中国富强,非急谋农业之改进不可,因此决心筹办岭南农科大学。他说:创办“农科目的,一面在养成实用人才,一面在改进农民生活”^③。岭南农科大学的创办得到孙中山和军政府财政部部长廖仲恺的支持,由省政府拨给开办费三十万元,自一九二一年起,每年补助常年经费十万元,并拨给坟地九百亩,建立农林试验场。纽约岭南董事局无意扩办岭南农科大学,于是钟荣光决心摆脱对外国人的依赖,单独由中国人组成岭南农科大学董事会,负责学校的领导和经费筹措工作。这是中国人收回岭南大学管理教育行政权的先声。岭南农科大学设蚕桑、园艺、农艺、畜牧等学系。它不仅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专家教授和科研骨干,而且为华南农业在改良稻种、推广瓜果优良品种和农产品加工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一九二二年六月,广东军阀陈炯明背叛革命,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只身走驻永丰舰。孙夫人宋庆龄化装脱险至沙面,钟荣光派汽船把她接到岭南大学,转往黄埔与孙中山会合,然后经香港安全赴上海。

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后,又曾两次偕夫人视察岭南,并发表演说,勉励“学生要做大事,不可做大官”和学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这是孙中山对钟荣光创办岭南大学的期望。

钟荣光在“五四”时期就曾提出过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教育权,中国学校由中国人自办的主张,其后不但在国内而且在海外募捐的各种集会上屡次宣传这一主张,受到各界人士和广大华侨的热烈拥护。

一九二四年初,钟荣光与美国人香雅各同任岭南大学监督(不分正副)后,他前往南北美洲为岭南农科大学筹款时,更加积极宣传收回教育权的主张。他在美国芝加哥青年会上演说:“兴办学校,实为现在救乡救国之事”,“岭南为中西合办,但靠人终非久计,应当尽量发达,以得将来接收华人自办”^④。同年六月,他在致书芝加哥少年报主笔时又指出:“中国教育何以免外人管辖?外国政府及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如与国际条约无背,不容易收归吾人自办,吾政府但按教育部章取缔之足矣。日本对于外国人在日本所立学校亦如此。岭南则并非美国政府及教会所办,其始只一二美国传道中国之牧师所发起,托某教会管理,其后脱离教会,在纽约改组董事局(一八九三年),担任

筹款与派教员等,至今董事屡易,全赖三五位名望人物勉力维持,并加入中国董事三人协助,至执行部则设在岭南校内,中国任部员者逐年增加人数,随时可收回自办。”他认为:“收回岭南之第一步,即今岭南农科大学。再进而收回岭南全校。”他还申明,他多年经营“期以逐渐脱出外人管辖者”,盖出于“念吾家子弟学生何以全靠邻人教育,吾国土地(农场)何得交与外国管辖”。又说:“光服务岭南二十五年,由学生而教习而至今职,自信深知底里,苦心全力,以收回岭南自办为唯一目标。幸农科大学成立,第一步已达到矣。”他向华侨呼吁:“大家鼎力则收回外人在中国所办学校,当以岭南为嚆矢。”事实正是如此,收回外人在中国把持的第一所学校就是岭南大学。钟荣光这种苦心经营、力求从外国人手中收回岭南大学教育权由中国人自办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一九二四年国共合作形成后,钟荣光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当时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右派在华侨中散布广东“赤化”的谣言,攻击国共合作。钟荣光在美国芝加哥向华侨演说:“粤省现有八省客军……中山政府擘画自属不易,吾人为粤省计,皆应协助之,而多加谅解。”

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岭南大学与广州各校师生响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反帝运动,举行游行示威,行经沙基时被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开枪杀死游行群众四十多人,伤一百多人,酿成历史上有名的沙基惨案。岭大教师区励周、学生许耀章中弹牺牲,十余人受伤。岭南学生会为此出版《沙基惨案真相》分发国内外,揭露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十七位美籍岭南教授也联名通电美国,要求主持公道,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独有英籍副监督白士德,发表为帝国主义暴行辩护的反华言论,受到师生的强烈谴责,被逐离学校。

一九二六年六月九日,岭南大学师生隆重集会欢迎为农科大学筹款、奔波南北美洲历时两年半归来的钟荣光监督。在全校公宴会上,钟荣光发表演说,再次申明他“此次出洋捐款,完全为农科大学收回我华人自办,向华侨募捐。近年来收回教育权之呼声日高,予不敢说有先见之明,但六七年前已觉教育有收回自办的必要”在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大会上,钟荣光满怀激情地发表反帝声明:“传教西人挟不平等条约而来。故我同学应继续努力,与群众一致奋斗,以期打倒帝国主义。总之,对外人之侵略,取抵抗主义,对内部之攻击,取不抵抗主义,欲达吾人之目的,必持以必死之决心……。人谁不死,只〔在〕死得其所耳。”^①钟荣光这种爱国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岭南师生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和“六二三”运动。据一位在“五四”当年参与省学联领导工作的广东高师学生回忆说:“广东在五四运动中,高师和岭南的学生,成为反日反军阀的有力群众。”“岭南学生都和我们在一起,并不后人!”他还说,作为广东省学联顾问和岭南大学领导人的钟荣光,曾计划组织学生军配合粤军驱逐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派他去上海向孙中山请示,因孙中山不同意而作罢^②。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钟荣光在双十纪念会上鼓励岭大师生要真诚信仰中山主义,要大家实力奉行,革命自然成功。他说:“现在我国尚为帝国主义者所压迫,不平等条

约尚束缚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如果遵从孙先生之遗嘱,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也不久可以达到解放目的。”又说:“现在非快乐的时期,是奋斗的时期。在这革命时代中,最不可中立,最不可旁观,因为辛亥革命至今中立和旁观的两派人,可东可西,不冷不热,已弄成今日不清不楚之政局。我们到今只有分别是非,今日之北伐战争是是非之争,应该一齐加入革命战线,然后能对外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打倒军阀。本校有工界、有学界,总要两家携手协助,同走上革命战线,以辅助革命之进行。”他告诫学生:“学生时代,旨在求学,但在求学之中,应不忘救国,有可以为国民利益的事,我们就要加以赞助”^⑨。

在北伐战争高潮的影响下,经过钟荣光和爱国师生的多年奋斗,岭南大学终于从美国纽约董事局手中收回中国人自办。一九二七年一月,岭南大学在国内成立了新的校董会。同年八月一日,新旧校董会举行交接典礼,原纽约董事局改名美国基金会。以新成立的校董会为岭南大学的最高行政机关。钟荣光作为新校董会主席兼校长在会上演说,指出:“接收本校的原因”是“(一)尊重本国政府教育法令;(二)顺应中国民族运动潮流,……”表示希望旧董事局改名基金会后,“将来为友谊上之助力”。并宣布“接收后之方针:(一)最低限度要维持现在之成绩;(二)保存基督教牺牲服务精神;(三)一切科学注重实用;(四)实行学生工读制度;(五)施行农村教育,以加惠农民”^⑩。

钟荣光接收岭南后,改岭南农科大学为岭南农学院,继续出国为学校募款。这时岭南学生包括大学、预科、华侨班、高初中和小学,总计一千余人,中西教职工二百余人。在二三十年代,它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我国已故的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画家司徒乔、诗人梁宗岱,乃至日本著名诗人草野心平都曾在岭南受过教育。廖仲恺、李济琛和孙科等都先后把子女送到岭南大学学习。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间,国民政府先后聘钟荣光为教育行政委员、华侨教育委员会常委、侨务局局长。由于他不满有职无权,也看不惯官场的腐败,便辞职返校办学。

一九二九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特赠钟荣光名誉法学博士学位。那时,岭南大学校董孙科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下属骨干和总工程师等多出身岭南大学。钟荣光商得孙科同意,由铁道部拨款创办岭南工学院,以培养铁道公路专门技术人才,并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设立分校,宋庆龄任上海岭南分校校董。

一九三〇年,岭南大学接收长堤外国教会创办的博济医院,这是孙中山青年时代学医的地方。钟荣光为纪念孙中山,积极筹办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一九三五年,他带着计划书向南京政府请款,领得五十万元的建筑费,建成了当时广州最堂皇美观的新型建筑物——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从而使岭南大学成为拥有文理学院、商学院、农学院、工学院、医学院的多科性大学,为南中国培养专门人才作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钟荣光在庐山养病一年。这时他已年逾七十,体力衰弱。一九三八年六月,他被任为岭南大学名誉校长,宣告退休。同年七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他被任为参议员,出席了这次会议。会后返广州办了岭南大学校长移交手续,旋迁居越南海防。岭南大学亦于一九三九年迁往香港。其后他几次飞往重庆出席参政会。一九四〇

年秋,日军进犯越南,钟荣光抱病偕夫人返香港疗养。次年九月七日,留港的岭南大学同学发起为他七十五寿辰祝寿,钟荣光从未做过生日,这次他打算借此为岭南大学开展百万基金募捐运动。他出任基金募捐运动会主席,亲作小启,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恢复岭南旧校充满信心。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岭南基金募捐受阻,钟荣光身陷敌境,心脏病日重,就医于养和医院,延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逝世,终年七十六岁。

钟荣光生前撰一联自挽:“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罪悔改以来,革过命,无党勋;作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唯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两半球舟车习惯,但以任务完成为乐,不私财,有日用;不养子,有徒众;不求名,有记述;灵魂乃真我,几多磨炼,荣归基督永生。”^⑩钟荣光在他的遗嘱中有如下一段:

“余夫妇生平以学校为家庭,不私财,不治产,余与妻曾双方订定,我夫妇无论何人先死,得同意后死者将家私什物公开拍卖,将所得款充作学额基金。”^⑪

钟荣光的挽联和遗嘱,充分表现出他毕生尽瘁岭南大学教育事业,以学校为家的献身精神。他没有子女,没有遗产。他的遗嘱还念念不忘扩建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和在岭南大学校内建筑纪念陆皓东、史坚如、郑弼臣三烈士的中学校舍;还要求把他的棺柩葬在岭南大学校园旗杆下梁发牧师的墓旁^⑫。抗日战争胜利后,岭南大学迁返康乐。遵照钟荣光的遗嘱,于一九四七年一月将其灵柩从香港迁葬岭南大学校园内。

注:

① 《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1912年5月7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59—360页。

② 岭南同学会编:《钟荣光先生传》。

③④ 《在美芝城青年会演说词》,《南大与华侨》第二卷,第一号。

⑤ 《致少年报主笔书》,《南大与华侨》第二卷,第三号。

⑥ 《本校欢迎会上的演说》,《南大与华侨》第四卷,第二号。

⑦ 《钟监督致学生父兄书》,《南大与华侨》特刊,第4页。

⑧ 李朴生:《钟荣光先生——严禁春节放假》,《传记文学》第六卷,第三期。

⑨ 《国庆日演说词》,《南大与华侨》第四卷,第三号。

⑩ 《在岭南大学新旧校董交接班典礼上的演说词》,《南大与华侨》第六卷,第一号。

⑪⑫ 《纪念钟荣光先生特刊》。

⑬ 梁发(一七八九—一八五五),是中国第一个宣教师,印刷工人出身,曾编写《劝世良言》,对洪秀全有过影响。他的骨灰于一九二〇年由钟荣光迁葬岭南。

(本文责任编辑:马庆忠)